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百年烟云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沧海一粟

李志刚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B978
15

98728

DH8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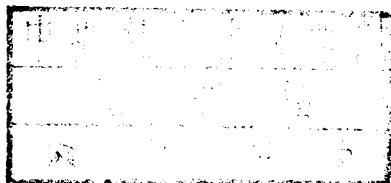
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李志刚 著



200131179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北京

85589

(京)新登字 1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李志刚著.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9

ISBN 7-5072-0412-X

I. 百… II. 李… III. 基督教史-史料-中国-1807~1949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720 号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梁衡 胡长清 舒乙 庆先友

主编:王志远

副主编:文庸 钟肇鹏 冯今源 章宏伟

常务编委:张世英 刘荫芳

望德专辑常务编委:文庸 马爱德

本书责编:文庸

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

——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

李志刚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51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5 000 册

ISBN 7-5072-0412-X·123

定价:(软精装)12.80 元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

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 25 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

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辩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

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

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一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丛书再序

《宗教文化丛书》面世，是在 1989 年春天，至今已整整六周年了。六年之中，丛书已陆续出版近 50 种，专著、译著和普及等三个系列都分别渐具规模。虽然平均每年只有八九种书出现在丛书的行列里，速度不算很快，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出了下来，没有中断，没有夭折，没有减色，硬是开辟了一方天地。不仅朋友们赞叹，就连我们自己——我和我的编委会同仁们，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也都禁不住发出一声感叹，真不易！

这不容易来自审批管理、原料涨价、发行不畅，也来自编审修校的繁重。为了保证质量和水平，原本应出得快一点的书，有时只能一修再修，宁慢勿滥。由于种种的困难，有几次我几乎要下狠心不再往下编这套丛书了，但负责编务的张世英老先生送来了作者希望出书、读者希望读书的封封信函，也捧上了他对丛书的热诚和辛劳。我的夫人刘荫芳女士则认为主编和劳累是同义词，无可怨尤，并且愿以同样的劳累投入繁复的编务工作。编委会第一任、第二任副主编文庸教授、秦惠彬研究员、宋立道博士、戴维熊编审、支鄂湘副编审及黄隽青副社长、艾杉等至交好友也不辞辛苦，做了许多工作。丛书顾问梁衡、宛耀宾、胡长清、孟纪青、舒乙、庆先友等先生都对丛书寄以关注和支持。这些热心、善良、睿智的人们深深感动着我，使我看到在今日之中国，是仍可以找到不计报酬，投身事业的知己的，这激励、鞭策使我不能将丛书停下来。

为了将丛书下半套 50 多种书坚持编完,在 95—96 年度丛书编委会聘请了各有所长的四位知名学者做第三任副主编——文庸教授、冯今源教授、钟肇鹏教授和章宏伟副编审,包括我在内,分别负责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其他宗教相关书稿的审定工作,力争比上半套丛书出得质量更高、速度更快。与主编总揽、副主编分头负责的新办法相应,丛书中将增加一种以专辑命名的组稿编辑方式,如基督教文化设“望德专辑”、伊斯兰教文化设“穆德专辑、佛教文化设“福德专辑、”道教文化设“道德专辑”等。设专辑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出好专著和译著,加大丛书的份量,提高丛书的学术价值。

历数近年来的某些丛书,其来势也猛,其去势也疾,用不了一两年,时过境迁,回头去追寻它们的人便很少了。《宗教文化丛书》却不然。新的品种固然受欢迎,老的品种也令人难忘,为了配齐,不少读者一再来信,有人还希望分类成函地出,他们宁可既保存着旧版,还要再买一套完整的新版。尽管由于渠道不畅,新华书店的征订数越来越萎缩,出版或再版都很困难,但丛书为需要它的读者而坚持了下来,并且与发行所一道,努力开辟与更多读者相见相识的道路。

劳累之余,我深入思索丛书层出不衰的原因。认真编审修校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如此操劳的丛书主编绝不止我一人,天下自当有过之者。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便是读者的需求。六年来,对宗教及其文化产生兴趣,希望认真了解、正确认识的人日益增多。对宗教和宗教文化固执偏见的人虽然还有,但他们也不同程度的地发生了变化,渐渐转向较科学的态度。这是大势所趋。

所谓“大势”,包含着中国大陆各界对本世纪以来甚至上溯更久一段历史中宗教及其文化的社会作用的重新审视和深思。

西方的中世纪和中国的宋元之后的宗教给思想界留下了人类思想桎梏的印象,而其超越性则被认为是对现实之不足的掩饰而

已。然而，当宗教仅仅被当做枷锁击碎时，击碎者却往往造出比宗教更无人性的枷锁，思想浮躁、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环境污染都成为新的无形囹圄；当超越性的神圣光环暗淡下去时，现实的不足并不因此就能在一个早上便完善起来，而人们在尘世名利的泥淖中却更加无以自拔。

文化界曾经认为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以及文学的对象和主体都是人，宗教不过是艺术的一层面纱而已。然而，自古以来最有震撼力的艺术作品却总是顽强地透露出它们深层里的宗教精神，而缺乏乃至没有这种精神的作品总是不能给人以灵魂的升华与安祥。

宗教经济是不是社会经济中既消极又具寄生性的成分，曾经是经济学界不需多辩的问题。然而，如果以这种所谓消极和寄生性即不能创造物质产品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文化和艺术等一切精神产品所附丽的经济成分则都难逃其咎。完全没有宗教的社会，在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的历程中迄今尚未出现过。从历史上看，一旦宗教观念淡薄、混乱，当时的社会必然出现信仰危机所引起的伦理道德危机，乃至影响到正常的经济生活。这常常使一部分明智的人们感到宗教文化的引导是何等必要，即便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供养也是值得的，就像人类其他精神事业需要经济支撑一样。况且宗教经济尚有其独特的运作发展形式，有不容忽视的巨大潜力。

至于宗教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往往被统治者利用，这个论断从政治侧面确实显示了历史的真实。它说明宗教的属性之一可用于调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一种事物能被“利用”，并非坏事，不管被谁利用，关键在于被利用去做什么。如果被用来为皇帝炼金丹、制红铅，或蒙骗百姓、坑财害命，以至祸国殃民，当然不好。但如果能巡民教化、安定社会、平抚人心、发展生产，就很难说不好。起码国泰民安对老百姓是件好事。当民不聊生时，宗教也会

被用来做反抗的旗帜,这说明它并不专属于统治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宗教与政治之间也颇有些水与舟的味道。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差异。传统宗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其性质和作用相对稳定,只要适应了新时代,发展趋向是有延续性的。而新兴宗教则有较多的不稳定因素,有些派别可以风靡一时,但对社会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很难估量,任意发展下去,甚至会走向反面。

我曾经讲过一个譬喻,说传统宗教就像一个内心善良的人,当他生活在冬季时,不得不穿上一件老棉袄。这棉袄在当时满新鲜、满时髦、满出色的,但日子久了,颜色褪了,破绽多了,甚至棉花都露了出来,还打了补丁,不仅不再招人喜欢,甚至还会引来对穿棉袄人的厌恶。其实那人还是挺善良的,他是有生命力的,他也意识到衣服已经破旧了,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留做回忆和借鉴,而自己则应在新春到来之际,渐渐地换上夹袄以至单衣。允许他换衣服,甚至帮助他换件可体的应时的衣服,以便和春天里的人们增进认同感,同怀善意走向未来,这难道不是当代各界的人们该做的么?

各界的审视和深思是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不乏错综与对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急于立即下定论,可以进一步探讨,应该沟通更多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是走向正确认识的正常趋向。

《宗教文化丛书》顺应了这个趋向,以学者的忠诚和严谨为这大势所趋推波助澜,从而才取得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宗教文化丛书》的宿愿是完成 100 种,而距离本世纪结束还有五年,50 多种书要在世纪末之前提早出齐,真不知还会有多少艰难困苦。但我相信这宿愿是能实现的,因为这丛书是为了迎接 21 世纪的,而 21 世纪不仅是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不断丰富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重新调整精神生活的世纪。迄今为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温饱实在不需

要再去以掠夺自己的同类来维持,需要的是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共建地球这个家园。科技达到相当水准,物质实现相当丰富之时,恰恰应是人类痛感精神要有所寄托之日。

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人们重新认识抖落了种种历史灰尘、经历了现代文明阐释的世界宗教的世纪,是在物质文明成功推进基础之上从罪恶之渊藪中爬上来向人类固有的善良本性方向复归的世纪。许多人“一生奋斗、老来归依”,并不是消沉,而是成熟的冷静、冷静的成熟,那是只有经历过之后才能有的觉悟。人类大约也像一个人那样有他的幼年期、童年期、青春期、壮年期……如果在 21 世纪人类能成熟一点,或许能放弃战争与暴力,走向觉悟与和平,而那正是千百年来宗教文化所企盼的!

但愿《宗教文化丛书》能为这一进程铺上几粒石子,但愿《宗教文化丛书》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仍能为人们提供一些往日的殷鉴、来日的信息,若能如愿以偿,十年心血亦不为憾!

王志远

一九九五年一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林治平序

文庸教授决定把李志刚博士所撰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论文汇整重编，列入“宗教文化丛书—望德专辑”在北京出版，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深信李博士的这本专著必能对关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整合、促进了解、丰富心灵的各界人士有正面而积极的功效。

在文教授选辑的这本书中，共有李博士所撰八篇重要论文。第1篇《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篇综论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博士特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医药事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五方面分别论述，条举目张，引证详实。第2篇《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查马礼逊原系第一位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自1807年进入澳门、广州以后，到今年正好190年，透过李博士这篇文章，吾人可对马礼逊一生的志业有所了解，特别是在190年前，身处极端闭锁的中国，马礼逊所遭遇之艰难困顿，盖可想见。第3篇《傅兰雅在华之事业及贡献》则是讨论一位有专业的基督徒如何以其专业知识献身中国，影响中国之现代化。有关傅氏在华之贡献首推翻译西书，促进西学。李博士于本文结论中指出：“论及晚清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最大者，若以中学西传而论，则理雅各牧师为翘楚；若以西学东传而论，则非傅兰雅莫属。”允为的论。李博士于本文中

复强调,“傅氏之来华绝非教会差派之教士,自1865年后与圣公会更无从属关系”,然其热心于中国现代化之媒介,全心全意贡献于中国社会,“实基于信徒内在信仰的实践”,“反映信徒对社会国家应有的责任,较之神职教士之参与尤有效益,影响更大”。换言之,傅兰雅系以平信徒专业人员之身分献身中国现代化运动,其工作见证实足作为今日基督徒专业人员知识分子之榜样。第4篇《林则徐禁烟与澳门基督教士关系初探》一文,则详细探讨林则徐力主禁烟的思想与当时在澳门的外籍传教士以及早期中外基督徒的关系。李博士在本文中,根据精确史料证明当时的传教士如裨治文等人,如何以言论及行动反对鸦片毒品泛滥成灾,言人所未言,诚为难得,实在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仔细判读。第5篇《中国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之认同新探》一文,则从孙中山先生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出发,论述孙先生如何从中国传统闭锁系统中走出,接受基督教信仰之经过,继之探讨基督教徒对孙先生信仰的认同,以证明中外基督教徒对孙先生的怀念与景仰;再则列举事实说明在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基督徒如何投身参与,奉献认同;最后则以徐松石、张亦镜、王治心等人的主张整合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基督教的神学信仰,是一篇独有创意,见解精辟的好文章。第6篇《五四运动与中国基督教复兴之探讨》则是针对影响中国近代思潮,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运动,说明教会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回应的经过。须知教会虽然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宗教组织,但任何宗教组织都必须落实在社会文化的框架之内,或者影响社会形成未来文化,或者被文化社会影响,逐渐世俗化,至终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原有的本质。李博士本文实在是一个探讨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相互整合的最佳范例,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新方向、新课题,是很值得注意的。至于本书第7篇《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第8篇《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代转变的适应》两文,均是以广学会为个案,讨

论这个基督教的传播机构在中国现代化途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影响。李博士于《广学会之发展与中国时局转变之关系》一文中，首先肯定指出早期基督教士在华之宣教事业实以出版事业为主要，而1920年前中国基督教之出版机构多具西方教会宗派之背景，其经费多来自西方教会之援助。在中国境内由热心信徒自由组合，不隶属任何教派公会者，则以广学会最具代表性。然后，李博士将广学会在中国之发展分为三大时期：满清时期之广学会、民国时期之广学会、香港时期之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依据时局之变化阐述广学会于各该时期所产生之应对及其影响与贡献。虽然李博士强调百年来因面对之社会文化结构不同，广学会均能扮演其应有之角色，然而作者仍然不免叹息基督教文字工作影响力之日渐式微。综观广学会在华三阶段之奋斗，第一阶段从广学会创立至民国成立(1887—1911)共24年，多由李提摩太主其事，广学会之出版物发行各省，尤其是知识分子、官绅阶层几乎人手一册，影响至为深远；第二阶段自1912—1949年，历时37年，其间由于李提摩太去职，继任者季理斐之编辑政策因应中国时局之转变而丕变，使得广学会之书报不再具有形成思潮、领导知识分子之作用。尤其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基督教已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力中完全消退。1949年后，广学会迁往香港，先更名为基督教辅侨出版社，格局大不如前，其后于1965年更名为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迄今，其影响力仅限教会内之少数。综观广学会百年史，其影响力每况愈下，实在值得读史者戒惧警觉，有所奋发努力也。至于《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局转变的适应》一文，作者开宗明义就指出，“任何出版社的成立，都须审度时势，认识社会需要，从而制定出版方针和发展方向。”因此，李博士在本文中详细分析广学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历史文化社会变迁中的调适适应之道。可惜广学会在近代中国的巨变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抗日战后的调适，并不能充分回应社会文化的变迁需求，以致

从影响力的中心消失减退，实在可惜。李博士在本文结论中慨然指出：“广学会自 1887 年创立，至 1949 年，在这 62 年的岁月中，中国经历自强运动、中日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种种的战乱。广学会处于不安的环境中，试图找寻最好的出路，为中国社会和教会作出贡献，但往往因客观环境的变迁而使广学会无从适应……明清时期是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民国时期则以教会信徒为出发点。若以国家社会为出发点，收益读者自然以一般非信徒居多，但这只限于西方文化知识传播的效应，与信徒少有关连。至于以教会信徒为出发点，收益读者自然以信徒较多，对神学教育和灵性增长亦多有果效。从广学会的发展阶段来看，文化和信仰两种目标，实难两者兼顾，况且世局的转变足以影响出版策略的转变。而广学会由创办至 1949 年，62 年来最大的危机是未能在本色化方面取得成效，历来出版的书刊以翻译居多；在经济上多赖外国的教会支持；人事上华人不能自主，事业发展必然遭遇障碍。”允为的论。

我与志刚兄是多年老友，因为研究的领域相近，经常向他请教，又因为我在台北宇宙光出版社担任义工多年，志刚兄每有新作，我常以出版者的身分仔细拜读，并为其大作安排出版事宜。这次文庸教授从宇宙光过去所出版的李博士的著作中精挑细选，编成本书，嘱我作序，这当然是我极大的荣幸，因此不揣简陋欣然命笔，是为序。

林治平

1997 年 3 月